

夏可君 —— 著

Ein wartendes und
unbrauchbares Volk

一个 等待与无用的 民族

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

Zhuangzi und
Heideggers zweite Keh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Ein wartendes und
unbrauchbares Volk

Zhuangzi und
Heideggers zweite Kehre

一个
等待与无用的
民族

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

夏可君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 / 夏可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301-28399-8

I.①一… II.①夏… III. ①庄子（前369—前286）—哲学思想—研究
②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①B223.55
②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950号

书 名	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 YIGE DENGDAI YU WUYONG DE MINZU
著作责任者	夏可君 著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399-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8.25 印张 198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献给 何乏笔

(For Fabian Heubel)

“自从我们是一种对话
并且能够彼此倾听。”

摩西还是中国，二者之中，
哪一个更可信呢？
——帕斯卡尔

没有什么比我们自己学会自由地
运用民族性的东西更为困难的了。
——荷尔德林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

目 录

Contents

001	楔子 哲学的转机
	第一章
029	第一次转向与反犹太主义
031	1.1 哲学的囚徒困境：无用的必然性
057	1.2 《存在与时间》：在被抛与筹划之间
069	1.3 另一个开端的争夺：希腊性与犹太性
	第二章
099	无用之思的总体渗透与转化
101	楔子 隐秘的第二次转向
122	2.1 荷尔德林诗歌的纯朴性
129	2.2 精神的贫穷与自由的无用
147	2.3 德意志转变为“无用的民族”
160	2.4 前苏格拉底的“必然”转译为“庸用”
170	2.5 存有的末世论与最后之用
179	2.6 庸用与虚化
188	2.7 庸用的危险与集置

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
——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

第三章

199	一个虚待的民族？
201	3.1 诗性的民族
210	3.2 庄子的危言与虚所的配置
226	3.3 感通的幽灵：论三种生产
243	余论 哲学的吊诡——两层存有论
261	跋记 无用的共通体：与让－吕克·南希对话
271	参考书目以及注释体例
280	关键词索引

楔子

Wedge

哲学的转机

0.1 随着海德格尔《黑笔记》或《黑皮本》(*Schwarze Hefte*)于2014—2015年的陆续出版,当前欧洲思想几乎陷入了海德格尔与反犹太主义关系的泥沼之中:

——要么让批判者具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乃至铁证,来全盘否定海德格尔思想的价值,认为海德格尔把纳粹思想彻底带入了哲学之中,导致了哲学彻底地暴力化,这既污染了他自己的哲学,也污染了哲学本身。甚至,激进的批评者还怀疑随后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所有思想,也同样都被此纳粹思想污染了,并有待于重新自我清洗,因而哲学的未来再次陷入灾变的停顿之中。

——要么认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在海德格尔总体思想及其多次转变中,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既有个人的迷误及其反复的自我反省(这在已经出版的《黑笔记》四卷中随处可见),也有时代精神的症候,“保守的革命”思潮在二十世纪德国非常强势,这也是为何海德格尔与施米特、云格尔等人一道,都在那个年代如此崇拜希特勒的种族神话与意志决断!这也是因为希特勒在1920年代写就的《我的战斗》一书最为现实与明确地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而海德格尔在1931年12月写给自己弟弟书信中可能推荐的就是此书并作为礼物送给他):西方欧洲的没落与振兴——德国文

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

——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

化的迟到与竞争——德意志人或日耳曼民族的羸弱与使命，只有德意志民族的振兴才可以拯救欧洲与德国，而这三者共同的敌人都指向了犹太人。随后的集中营大屠杀导致了历史的灾难，德国人要承担的历史责任还需要反省，面对西方文化的总体败坏或无可辩驳地失败，现代性启蒙的事业其实远未完成。

——要么面对海德格尔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沉默（也许海德格尔并没有彻底沉默？他竟然认为电动化的食物工业化生产与灭绝营毒气室对于尸体的生产一样，也同样认为德国人战争中的死亡与犹太人集中营的被屠杀是同等重要的），哲学的责任自此就是继续思考此沉默并且解构他对于死亡的存在论命运式区分，或者通过海德格尔思想与策兰诗歌的对话，进入沉默的深渊与余存的见证，但现代性的生命也更为残碎，更为无余！如何再次进入默化之思？是沉默中死亡还是沉默中转化？从革命的总动员到东方式默化，之间有着转化的余地吗？尽管阿多诺已经在《否定辩证法》中指出西方文化总体上的败坏以及沉默的危险，但沉默的转化还有待再思。

——要么再次彻底面对西方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清理出西方文化与德国文化内部的反犹谱系，并试图回到西方唯一神论内部去寻找可能的出路，无论是左派的基督教回归还是犹太教卡巴拉神秘主义的被唤醒，但又如何面对伊斯兰教当下的复兴所再次激发的唯一神论冲突？如何面对当前甚嚣尘上的种族主义与强权政治？三个唯一神论之间的持久冲突有着化解的可能性吗？有着彼此存活的余地吗？有着“余让”的可能性吗？

以上诸种进路，无论是政治左派的革命运动还是启蒙理性的社会批判，无论是历史灾变的反思还是宗教回归的行动，似乎都无力回应海德格尔于 1930 年代对整个现代性之为“谋制”（/ 力造性 / 力制性：Machenschaft）的严酷诊断，以及 1940 年代后期开始对技术“集置”（Ge-stell）更为彻底的批判。

因为海德格尔不仅仅反犹，而且反对现代世界的各种组成力量：无论是犹太文化或犹太教（计算思维与文化拔根的开始），还是尼采的强力意志（主体意志的强化与超强意志），无论是美国化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结合基督教），还是前苏联的共产主义（苏维埃加上电气化），无论是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技术生产与主体强力意志的结合），还是总体动员的战争（战争谋杀的暴力武器与唯一神论的世俗化独裁政体相结合），这些不同的力量，尤其是欧洲的美国化，有些看似彼此冲突乃至充满激烈的争斗，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它们都在“力造性”中相互交织与合谋，并且在技术的“集置”中，导致存在的危险与使用的灾变，已经彻底导致世界的荒芜化，导致世界的非世界化，在整体上，都处于自我毁灭之中。

——再一次强调，海德格尔如此严酷的诊断与批判，在整个现代性思想中实属罕见。因此，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一方面继承了西方传统已有的成规俗套的反犹主义而未加自我反省，另一方面，则是把反犹主义置于技术虚无主义的现代运动中。如此错综复杂的反犹主义，就如同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可能是“存在历史的反犹主义”，也可能是“形而上学的反犹主义”；或者可能是“文化历史

的反犹主义”；或者可能对犹太人的批判是对西方文明的自身批判；或者是一种未加深入反省而自我怨恨的“平庸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思潮在1920—1940年代的德国异常流行，就如同法国维希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化的反犹主义”，很多作家都有此态度；或者可能是“反现代性的反犹主义”；或者，甚至可能还是“存在末世论的非犹主义”（从反犹主义及其认同中有所脱离出来了？反犹与否不是一个问题了？或者，甚至是更为彻底地反犹主义，既然海德格尔已经彻底不相信唯一神论传统，因而也再次漠视了犹太教的绝对他者性）。等等。

这都来自于海德格尔对现代性之总体诊断的独特思考与规定，即，认为现代性走向了技术化“集置”的危险而导致着自我毁灭的命运，并认为犹太人是这个拔根与计算化理性的始作俑者，因而必须反对犹太教及其文化，海德格尔一直认为此反犹主义并非种族主义层面的纳粹意识形态。

但如此的反犹在1930—1940年代，又如何与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准确翻译应该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彻底区分开来？难道不是缠绕与纠结在一起？关于民族与大地、国家与精神、决断与争斗、敌人与灭绝等等的一系列话语，难道不已经彼此“污染”与相互“渗透”了（如同德里达所指出并反复解构的）？

0.2 作为亚洲的思想者，或者作为一个中国思想者，也不得不

认识到，我们自身的文化同样也有着京都学派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合谋，也有着中国“文化大革命”总体动员的暴力，如何带着历史的责任与思想的反思介入到这个讨论之中？并且给出不同的思考视角？乃至给出可能的出路？真有所谓的“旁观者清”？当然不可能！恰好只有在“痛点”上的持久停顿与深刻感受，思想才可能打开其他的可能性。在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背景之后，并且进入文本细节的艰苦解读中，中国学者是否可以发现新的视角与回应问题的新方向？更何况海德格尔及其后续的思想，已经成为汉语思想的核心建构部分，思考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牵缠及其可能的出路，也是汉语思想自我反思，走出自己历史困境的要求，并且具有世界哲学的启发性。

随着最近二十年来，大量海德格尔手稿的出版，其中有着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一方面或一个阶段，首先是1932—1942年海德格尔明确开始“第一次转向”的相关文本，这以GA65卷（《论成事》1936—1938年）为中心，自1989年该书出版以来，整个学界都集中于思考Ereignis（事件/居有/成己/成事/大道），激发了对于“事件”的不同思考；但另一方面或另一个阶段，随着最近十年来，1943—1953年期间文本的陆续出版，尤其是GA77（《林间路—交谈》：1944/1945）、GA73（《走向成事—之思》：1943—1945）、GA75（《面向荷尔德林》：1943—1946）、GA79（《不莱梅讲座》：1949）、与GA97（《评注I—V》黑笔记：1942—1948）的出版，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思想中隐含着“第二次转向”（zweite Kehre），尤其在GA79卷1949年的不莱梅公开讲座中，这个“第二次转向”的思想基本成熟

并且有所公开，其中“转向 (Kehre)”一文，明确指出了“存在遗忘”这个历史新阶段的急难处境，主要针对的是技术“集置”(Gestell，这也是1945年之后对于现代性的新规定，已经不同于之前的“谋制”：Machenschaft)，当然其针对的“敌人”也不同了，不再是尼采与犹太文化综合的技术虚无主义，甚至不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灾难，而是“技术”以及技术对自然的生产所导致的各种死亡。而且我们认为“第二次转向”，随着《黑笔记》反犹太主义的暴露与危险，反而有着更为积极地意义，即，其中有着海德格尔1943年试图走出反犹太主义的欧洲思想，隐秘地开启了“亚洲转向”的可能性（这是针对随后冷战开启的“欧洲美国化”而言，几乎遗忘了欧洲与亚洲的关系，当然“欧洲的道家化”也是争论的话题）。

当然，依然可以反问：如此对于技术更为彻底地规定与思考，既然还在继续推进了对于“谋制”的思考，不也顺带继续着他自已更为彻底地反犹太主义？即，不是放弃了之前的反犹，而是以技术危险的名义，再次推进了更为彻底地反犹，尽管他不再提及反犹太主义，因此一切并没有改变，反而更为严重！既然海德格尔再次忽视了唯一神论绝对他者的前提条件，忽视了犹太性之为他者性的超越性，哪里有着自我批判？但海德格尔也彻底批判了唯一神论与独裁政体的关联！通过对“存有之灾变”(die Katastrophe des Seyns)与“转向之灾变”(die Katastrophe der Kehre)之更为彻底地反思（在GA97卷中），海德格尔“似乎”放弃了之前第一次转向的所有斗争与灭绝姿态，放弃了之前的斗争意志，由此而观，其反犹与否——是否就

变得不再重要了？因而开始了隐秘的“第二次转向”？通过再次的转向而实现一次尼采式的彻底“颠倒”或“悔改”（umkehren）？海德格尔如此彻底的思考既是针对“第一次转向”导致的灾难，也是认识到存有本身显现的危险，正是认识到此危险，也许由此可以发现“另一个海德格尔”？哲学难道不是一直试图去发现这另一个海德格尔？发现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可以有助于我们发现海德格尔思想的其他可能性？尤其面对纳粹问题，面对 21 世纪当前种族主义与独裁政体的再次兴起？

这一次，面对一个在《黑笔记》中如此纳粹化的海德格尔，如何可能从中剥离出某种积极的要素？如何既要彻底反思与批判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反犹主义，又要彻底发现与重构海德格尔思想走出迷途的道路？如何以海德格尔的方式去拯救海德格尔？如果哲学是去思考哲学所尚未思想的，如果海德格尔《黑笔记》其实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校长就职以及对于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一直在书写与辩驳，一直在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还有什么是他一直在思想着——却又尚未思及的东西？针对存有的末世论，面对技术集置的危险，转向自然化的生产以及自然化的无用性，就可以重新开始？海德格尔似乎并没有把“无用”与“自然”更为直接地关联，尽管“第二次转向”的隐秘思考又有此诉求。

0.3 吊诡之处在于：似乎海德格尔的思想形象越是与纳粹魔鬼

打交道，越是转化为“新天使”，如同克利绘画的新天使形象（既是拯救者的形象也可能是魔灵的预象），或就是后来本雅明 1940 年去世之前发现的历史新天使形象（天使被背后由天堂吹来的风升起时，他前面的废墟也在升高）。海德格尔越是执念于纳粹发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运动，他就越是绝望，最终断除了对于西方文化整体上的执念，借助于中国的老庄思想，打开了哲学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似乎越是“执念”，才可能“断念”得如此彻底！从“有执”到“无执”的这个转化与断裂是如何可能的？GA77 卷中在俄罗斯战俘营的虚拟对话（既模仿柏拉图又模仿庄子），让德意志民族生成为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这是从未有过的转变，这也让哲学处于囚徒的困境与倒悬的处境之中。

这是海德格尔与中国思想的关系导致了这“第二次转向”？海德格尔既肯定了这个异质精神的重要转化价值，很多研究者也发现了表面的实证资料（尽管关于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主要是亚洲与美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欧洲的主流思想家们对此并无太大兴趣），但奇怪的是，海德格尔自己后来似乎还否定了这个来源，认为还是要回到西方自身的危机与自身化解的方向上（如同当前欧洲学者几乎都回到唯一神论内部来解决自身危机）。一个并不会说汉语的海德格尔，却试图翻译老子的《道德经》，他当然思及、也触及了中国思想（尤其是 GA77 卷《林间路－交谈》中写于 1945 年德国战败日的对话结尾，引用了庄子与惠子关于“无用的必然性”的对话），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又并未充分地去思考。